



邓云乡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邓云乡集】

云乡丛稿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乡丛稿/邓云乡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1

(邓云乡集)

ISBN 7-5434-5452-1

I. 云... II. 邓...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2735 号

——邓云乡集——

云乡丛稿

作 者: 邓云乡

策 划: 张国岚

特约编辑: 王湜华

责任编辑: 王亚民 孟保青

封面设计: 张志伟 李关栋

出 版 者: 河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排 版: 保定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299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452-1/K·259

定 价: 20.4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8641274

邮购地址:050061,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wfbooksell@vip.163.com)

目 录

民俗学与中国民俗	(1)
——宏观当前中国民俗学研究	
跨世纪的国际汉学会议	(9)
风俗、历史、文化	(15)
——民俗琐谈	
元人词中之北京风俗	(20)
——欧阳玄《渔家傲南词》解说	
酒与民俗	(70)
酒史三题	(90)
——酒礼、酒政、酒榷	
中国葬礼历史演变	(116)
八股文与清代教育	(129)
《眉园日课》书后	(136)
抗战时期后方物价简介	(163)
上海旧时地价与房租	(175)
雍正《圣谕广训》	(179)
红楼茶事	(194)
“八旗”武事盛衰在《红楼梦》中的反映	(203)
“红令”与“金令”	(214)

苏州“贵潘”四题	(219)
翁松禅《谢家桥词》	(239)
俞曲园日记	(247)
陆心源珥宋楼	(256)
陈师曾艺事	(263)
姚茫父与陈师曾	(275)
常熟才子杨云史	(285)
江亢虎其人	(295)
史学家柯昌泗	(301)
《旧都文物略》小记	(306)
读《荷堂诗话》	(317)
《北平笺谱》史话	(319)
——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年祭	
夏、叶《文章讲话》	(350)
民国笔记二题	(356)
《中华活页文选》	(368)
百年商务旧话	(373)
科学、国学……？	(383)
——世纪前期科学家	

民俗学与中国民俗

——宏观当前中国民俗学研究

在国际性的人文科学领域中，人们说文化学、语言学、民俗学是三大显学。在现代汉语词汇中，“民俗学”这一词是个外来语，是从日本文中直接引用过来的。日本文译 folklore 一词为“民俗”。中国最早译这一词为“谣俗”。但“谣俗”一词未流传开来，“民俗”、“民俗学”却流传开来了。在中国虽然经过若干年的冷落，在近十年来年中，却又十分活跃起来，这是很可喜的。

民俗学从它接触的范围说，它的研究范畴是十分广泛的。就学术范畴讲，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美学、文学……这些都可以和民俗学扯上点关系，具体到生活实际上，它又与饮食、衣着、建筑、礼仪、婚丧、娱乐等等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民俗的差异，都从这些具体的生活习惯上反映出来。以中国来说，过去有句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即相隔百里之遥，在风俗上，或者说在民俗上就有不相同的地方。何况中国地方那么大，民族那么多，历史那么悠久。各个地区有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各个民族又有各自的传统习惯、宗教信仰，各个历史时代又有许多不同的变化。再有从古至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也都不是孤立的，互相又有着交流、影响，风俗、民情也都不断因这种相互的交流与影响改变着，既各有传统，各有差异，又互有共同之点，

类似之处。这样就更表现出民俗的多样性，应该说是缤纷绚丽、异常复杂的了。

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时代之间，民俗都有着差异，而且地区、时代距离越远，其间差异越大，而人类又具有本能的求知欲，强烈的好奇心，而且文化越发达，知识越广泛，来往越频繁，就越想多知道一点不同的奇风异俗。或以好古之心，想了解其历史；或以好奇之心，想探索其源流；或以爱美之心，鉴赏其表现；或以好美之心，雅爱其淳真……。总之，人们基于热爱生活的善良愿望，对于有关民俗的一些现象去注意它、观察它；对于有关民俗的一些知识学问感兴趣，去学习它、研究它，这些不但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提倡的，因为这些研究，对于人们的文化生活，总是起到丰富作用的。对精神文明的建设，说来也是有益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笼统地说一句“民俗学”，是十分方便的。但要说的更实际些，那还大有阐述的必要。六十多年前，江绍原氏翻译了英国俗学会会长瑞爱德氏（Arthur Robertson Wright）的《英吉利谣俗（English Folklore）》一书，周作人在为此出书的《序言》中说：

民俗是民俗学的资料，所以这是属于民俗学范围的一本书。民俗学——这是否能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似乎本来有点问题，其中所包含的三大部门，现今好做的只是搜集排比这些工作，等到论究其意义，归结到一种学说的时候，便侵入别的学科和范围，如信仰之于宗教学，习惯之于社会学，歌谣、故事之于文学史等是也。民俗学的长处在于总集这些东西而同样地治理之，比各别的隔离的研究当更合理而且有效，譬如民俗学地理歌谣故事，我觉得要比较普通那种文学史的——不自承认属于人类学或文化科学的那种文学史的研

究更为正确，虽然歌谣故事的研究当然是应归文学史的范围，不过这该是人类的一部之文学史罢了。民俗学的价值是无可疑的，但是他之能否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则颇有人怀疑。所以将来或真要降格，改称为民俗志，也未可知吧。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六十多年前，西方的民俗学刚刚在中国兴起，一些前辈学者们或者译书，或者收集歌谣，或者实地调查，或者办刊物，或者成立学会……的确热闹过一个时期。江绍原先生翻译瑞爱德名著，也是给新兴的中国民俗学作个借鉴。周氏序言代表了当时研究民俗学的大多数意见，他又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所以我把他的《序言》多引用几句：主要是想从中提出几个问题讨论一下。

一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问题；二是民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问题；三是中国民俗学的未来问题。

这三个问题又有连带的关系，还必须从根本上说起。民俗学来源于民俗，民俗来源于民众的生活。这民众应是广泛的。即各种阶层的民众，在今天似乎不宜仅限于没文化的庶民。这生活又是有历史性的，即从古至今的生活。这样概括来说，想来是不会大错的。因而民俗学虽然是本世纪前期由西方经日本汉译输入中国的名词，但民俗在中国则是古已有之的。这早已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据各种辞书解释，民俗学又称“谣俗学”，从事民间流传之信仰、习俗、故事、歌谣、谚语等研究。按国际通用民俗学“folklore”一词，是“folk”和“lore”两字组成，前一字是没有文化的土著民众的意思，后一字为知识和研究的意思。因其内涵的特定意义，使人很自然地想起我国古代“采诗观风”的故事。《史记·乐书》中说：

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

补短移化，助流政教。

《汉书·艺文志》中说：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都是周代各诸侯领地的民歌，这不同民俗学收集歌谣加以研究分析方式大体一样吗？因而“民俗”一词，如按日常口语说成“民间风俗”，这就更全面了。因为“俗”字，在《说文》中训“习”，也就是从历史上形成的习惯。民俗，简言之，就是民众从历史上形成的生活习惯，这是广义的，既能包括流传之信仰、故事、歌谣、谚语，也包括广泛的衣、食、住、行各种生活习惯。这些都有其历史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在内。中国历史上习惯用“风俗”一词称之，其内涵较“民俗”一词更全面，更科学些。中国在传统上，“民俗”一词虽然不大说，而“风俗”一词，却是说了两千多年的老话。《汉书》中解释“风俗”的意义说：

凡民涵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律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应劭《风俗通义》序中说：

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谣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

根据中国传统的解释，对风俗的形成、分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以现代科学观点来衡量，有它一定的客观科学性。即从远古到现代，人类的生活，总不外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自然的，二是人为的。前者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物产等等。后者如

政治法令、宗教信仰、教育文化、战争破坏等等。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经过长期历史的流逝，在自然和人事的双重影响下，既有其传统的肇自先民的特征，又有其随着历史演变、地域民族交流而形成的不断变化，这样“风俗”一词，内涵就极为广泛，表现就极为丰繁了。如作为研究对象，延展开来，深入下去，分析其成因，远古的形成，近古的变化，区分其善陋，引导其发展，因习俗之所宜，制礼法之善则，这样不但可以成为一种学问，而且是一门内容十分丰富、大有研究价值的学问了。周作人氏序绍原所译《英吉利谣俗》时说：“民俗学的价值是无可疑的，但是他之能否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则颇有人怀疑……”如果研究对象及范围仅限于歌谣故事、谚语等等，那是有些单薄，如果扩大一些，把西方传入的民俗学与中国传统的民俗研究结合起来，那“民俗学”便可成为“风俗学”。这样把“风俗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不但有其研究的实际意义和价值，也有其极为广泛的内容。如以中国风俗作为“中国风俗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那么这门学问自然也纳入汉学的大范围之内了。

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最早始于近七十年前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等学术团体，其后广东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等，这都是前辈学者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等先生，以及现在健在的钟敬文老先生诸位在六七十年半个多世纪前作过努力，取得一定成绩的。但如扩而大之，把范围扩大到“风俗学”——如果这个学术名称可以成立的话——那远远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努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取得不少成果，纵然没有“风俗学”这一名称，而风俗研究的成果却是客观存在的。周代的采诗观风制度，《诗经》的“十五国风”，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这些时代较远，先不必提。即以近现代

说吧：一九一〇年（清代宣统二年）张亮采氏写的《中国风俗史》，一九二二年胡朴安氏编的洋洋巨观的《中华全国风俗志》，都是这门学问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的诞生，或在“民俗学”研究产生之前，或在其同时，但其内容及范围，则远远超过由西方引进的“民俗学”的较狭窄的范围之外，而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风俗研究体系的。

在中国民俗学的提倡和研究，自半个多世纪前“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多种因素，消沉了数十年，直到七十年代末，经顾颉刚、钟敬文等八位老教授大声疾呼和积极倡导，消沉多年的民俗学研究，才又活跃起来，不少人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有人作纯学术的研究；有人又调查实际入手，收集各种实物及文字资料；有人整理编辑前人著作，出版民俗书籍；有人举办各种有关民俗的展览会、博物馆……总之，近十年来中，民俗学的研究及其影响是十分广泛的了。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目前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各项活动，比如各种民俗丛书的编辑，各种地方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其内容已不仅限于西方民俗学所归纳的简明定义，如文明社会中残留的古代遗风，俗民文化的传统部分，口头流传的民间歌谣、传说、谚语等，未形成宗教的各传统仪式……而是远远超过这些，把各种传统风俗内容也包孕在内了。从研究实际讲，中国民俗的研究，也就是中国风俗的研究；“民俗学”和“风俗学”在中国学人的研究当中，似乎可以划等号了。实际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从客观上讲，“风俗”这一概念的内容包括“民俗”，而“民俗”却不能包括风俗这一广义概念的内涵。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自然是中国民众、中国社会、历史的和现实的必然要继承中国风俗传统研究的成果，可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深入的，自不可能是脱离中国历史延续的、断代的、孤立的。如果那样，就不可能有中国民俗学了。

中国民俗学本身的特征，是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有着广阔的疆域，又有着众多的兄弟民族，又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实物和文献……这些特征就给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如把中华民族风俗研究纳入国际汉学研究的大范畴，那前途也是极为广阔的。其研究范围，自是十分广阔：有历史的，也应有地区的；有宏观的，也应有微观的；有综合的，也应有部门的；有汉民族的，也应有兄弟少数民族的。其研究的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资料的收集，实际的调查，历史的比较考核，科学的分析研究，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才能取得成果。至于研究的目的，从个人来讲，一般自是学术性的研究，从所从事的专业爱好出发，即孔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入之愈深，乐之弥笃，自然可以取得个人的一些成果。但从民俗学的研究整体来说，则是有关民族文化进步、发达、移风易俗的大问题。

国际上民俗学（folklore）成为一种学问，始于托马氏（N.G.Thomas）创造的这个名词，是一八四六年的事，距今不过一百五十年。比之于中国类似的采风的对风俗的重视等传统，自然要晚得多。国际的民俗学在五四运动时代影响到中国，当时北京大学创设“歌谣研究会”，发行《歌谣周刊》，出版介绍了不少欧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对译名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先译为“谣俗学”，后来还有人提出用“民学”，也有人提出用“风俗学”，后来直接引用了日本的译法“民俗学”。这一名称比较普通，大家容易接受，便叫开了。当时有人提出，“日本人所谓‘民俗’，虽然有时是民间——俗间的意思，移植到中国来，却颇有被误解为民间风俗之危险”（引自一九三一年版江绍原译英国瑞爱德《现代英国民俗与民俗学》一书的附录七）。近十年来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实际上正合了这六十年前的预言，是把“民

俗”与“民间风俗”二者在不少地方混淆等同起来了。但我感到这既不是“误解”，也没有构成“危险”，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客观的存在，正常的现象，必然的发展趋势。中国民俗学的研究，首先必须是注意中国民众、民间风俗的原始、形成、演变、发展……由认识到理解，由理解到引导，其间既不必、也无法区分西方民俗学的特定内涵，和中国广义民间风俗纷繁现象的区别，也不能排斥传统的风俗研究文献和成果，必须将大量的历史资料充实到现代的研究范畴中。所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必须是更为广泛的民间风俗的研究，当前一般关于“民俗学”的认识和研究，基本上是这样的。六十年前，汪馥香先生在《民俗学资料征求引言》中说：“我们所谓‘风俗学’，简而言之，是‘遗风习俗’之学；详而言之，是研究一切前代传承下来的下层构造及上层建筑，及作以前的各个时代底前代传承底研究的学问。”六十年前的白话文，有时在“的”和“底”的使用上，现代读者感到不大顺口，但其意思还是可以理解的。他当时已提出了“风俗学”这一名称，也是和“民俗学”划了等号的。今天我又提出来，想来也不算标奇立异罢。分析自然还不够详尽和透彻，但从宏观上看，中国目前方兴未艾的民俗学研究，实质上正是这样的，未来也应该循着这条道路踏踏实实地发展下去。

进一步详细论述，可说的话还多，但为了避免枝蔓，主要的意思就说这些吧。

跨世纪的国际汉学会议

今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国际汉学会。会议全名为“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因为这次盛会在本世纪九十年代召开，其回顾自然是在此以前的几十年，而其前瞻呢？恐怕就不仅限于本世纪最后几年，必然要延展到下一个世纪。因而本文命题为《跨世纪的国际汉学会议》，题目很大，不过这里只想作一个简单概括的介绍。

“汉学”这一概念，在国际上目前包括中国哲学、史学、文学、语言等方面。这次新加坡国大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还包括“华文教育”，面是很广的。如细分，那各种专门学科，自然就更多了。

没有特定专题，这样综合性的国际汉学会议，过去也曾举行过。一九七二年五月曾开过“第一届纽西兰国际汉学会议”。这次会议中国大陆没有人参加，想来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大。新加坡国大这次的国际汉学会议特别邀请大陆三十多位代表参加，可以说是空前的国际汉学会议。所以，像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汉学会议，如果没有中国大陆代表参加，那终究是遗憾的。

大会三百多位正式代表，来自亚、美、欧、澳几大洲四十四个城市，自然是亚洲地区的代表最多，除东道主占绝大多数外，

邀请中国大陆的三十多名学者。另外台北、香港的代表也相当多。其他远道的客人，欧洲柏林，澳洲堪培拉、悉尼，美洲西雅图、夏威夷等地代表，也都不远万里，参与盛会。

大会共提交论文一百四十多篇，大分类包括文、史、哲、语言及综合介绍所在地区的汉学发展情况。如从论文的具体内容来看，那占有的学术领域面是非常广的，可以说是洋洋大观。在哲学方面，有先秦孔子思想、宋明理学、新儒学、道教等多种方面研究的论文。在文学方面，从时间上讲，先秦、两汉、六朝、唐以后直到近、现代，从体裁上讲，散文、小品、小说、戏剧、诗、曲以及俗文学。史学方面的论文涉及领域也很广泛，由史前考古学到断代周秦、两汉、隋唐、宋元明等时代，各种问题都有专文论述。在语言方面，有传统的音韵学、校雠学、文字学外，尚有现代的修辞学、语言比较学等等。对海外华人社会说来，还有更重要的双语制度下的华文华语教育问题，这方面的论文也很多。

中国大陆的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大多概括地介绍了四十年来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概况，如唐诗、唐代文学、古典散文、考古、古文字、文学理论、古代文论等等。这些概括介绍的论文，都总结了中国大陆这些学术的发展道路和研究情况。这些论文对大陆以外的学者无疑说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说来说去，“国际汉学”还总是以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为根本的。了解大陆研究情况，对海外学者那是十分重要的。

大陆以外学者也有不少篇概述性的论文，如近四十年台湾元史研究、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香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传统小说研究在美国、汉学研究在澳洲、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七十年、汉学研究在法国等。这些论文，也使大陆学者眼界大开，了解到海外近几十年中研究中国学问的情况。如仔细地阅读这些

论文，或者会忽然领悟到，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中，纵然是古老的“《五经》《四书》、孔孟李杜”，也早非中国所“特有”，而是西方国际汉学研究的课题，并不断发展的研究内容了。早期的国际汉学研究大本营在法国、在欧洲，主要是古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心由法国转往美国，由于各种优越条件，近几十年中发展十分迅速，研究范围，也由古典转向近现代，研究内容大为延展、广泛，远非本世纪前期伯希和、高本汉等西方汉学家时代可比了。

这次会议，重点是“回顾与前瞻”，回顾有事实作根据，说来是比较踏实的。但在回顾中，也看到近几十年国际汉学的发展趋向、速度和轨迹。据此前瞻，在新的世纪中，国际汉学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这是可以断言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进一步分析之，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而且有文字记载已历四五千年，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吸收外来文化，白马驮经、佛教输入、小野妹子留学、马可波罗东游等等老话，且不必多提。只说本世纪之初吧，西洋欧洲、东洋日本，就有不少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大名家、重要著述。如瑞典的高本汉、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青木正儿、英国的李约瑟。像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巨著，在中国国内也很少有人比得上。近百年中，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当然主要是为了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大体可分作三个阶段，一是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翻译《四书》、《五经》，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传教。二是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作为学术来研究，尤其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开始，殷墟甲骨文、敦煌唐人写经发现之后，大部分出土文物被掠夺到西方，西方研究汉学之风更盛。三是中国大陆解放后，国内学人一小部分到了香港、美国等地，加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力量低落，这样原在法国的国际汉学中心，便自然地移到了美国，而研究的内容也大

为扩充，其研究内容，除传统古典历史文化外，更注意到了近代中国。美国各大学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培养了一千多位研究汉学的博士，其中不少人都是研究现代中国的，如以研究沈从文作品著名的金介甫博士。这种以研究现代中国人著作而得博士学位的情况，在本世纪前期的国际汉学界是没有的。

“汉学”一词，在我们国内，应该说的不适用的。我们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本国文化，由传统到现在，它是延续着的。何况现在国际上“汉学”一词的涵义，就是“中国研究”的意思，因而国际汉学的根本和源泉，还在于中国国内。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即国际汉学是中国研究，目的在于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而中国国内学术界、学人，也必然要了解国际汉学研究、理解中国的情况，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本位文化的重要国际地位——传统的和现在的，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坚定弘扬本位文化的信心。可惜的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国内大陆学术界一般人士，对这方面了解的太少了。我有幸参加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次盛会，并拜读了与会者一百四十来篇论文，使我眼界大开，了解了一些国际上的汉学研究情况，不由地产生了一种感想：世界那么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我们不是更应该重视学习我们自己的传统历史文化吗？

国际汉学研究，在本世纪后期，远远超过了本世纪前期。欧美、日本不说，就以遥远的澳大利亚来说吧，自五十年代中期，悉尼大学就成立了东方研究所，提倡汉学研究。目前则有澳洲国立大学、麦克理大学、墨尔本大学、马纳西大学、阿特里大学、昆士兰大学、葛礼菲大学等多所，均设有中文系或中文课程，以中国文字、语文讲读，以中国书籍作为研究课程。这样广泛的汉学学习和研究，在本世纪前期是想像不到的。国际汉学自本世纪初，发展到本世纪末，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那么下世纪如何